

管辖克制：法律系统在个案接触点上的“不看”之能力

不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多元规范，而是法律在某些个案上是否具备不去看的能力

高鹏 著 · SDE 学员 · 法律多元主义与制度设计 · 2026年7月26日

摘要 法律与民间法、道德、习俗、宗教及行业伦理等多元规范的协调，长期以来被预设为一个“如何更好地相互吸纳、承认或对接”的问题。本文通过概念分析与历史制度研究，揭示了这一预设的盲区：每一次以“吸收”“承认”为名的制度操作，都伴随着法律用自己的程序——暴力正当性土壤，单向置换其他规范赖以存活的稠密关系与共同记忆。这种置换并未增进协调，反而将双方推入一种彼此虚弱却相互倚靠的“共享枯竭”稳态，并催生出一套以公序良俗条款、司法确认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为咬合点的“替代品生态”——它运行平稳，但其功能已从协调异化为对协调需求的制度性消化。本文追溯了十二世纪以来法律整合其他规范的三次关键历史分叉，发现一种被反复埋没的制度旧可能：法官在个案接触点上，制度性地决定“不该看”——即管辖克制能力。通过将这一旧可能置于当代制度硬约束下重新设计，本文提出了以“管辖不评价协议”为核心的程序工艺包，并建构了其在三十年尺度上可被实证检验的完整研究纲领。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法律与其他规范之间真正的协调缺口，不是法律该做多少，而是法律从未将“该不该不看”这件事，当作一项必须被注意力分配制度所保障、被绩效考核所奖励、被外部共同体所评价的核心司法任务来建设。

关键词：法律多元；管辖克制；规范协调；司法制度；替代品生态

1 引言

1.1 问题的现实紧迫性

2023年，中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首次突破4500万件，而同期人民调解组织处理的纠纷数量虽在纸面上持续攀升，但其协议自动履约率却呈现出不可逆的下滑趋势。这一“剪刀差”现象标示出一个隐蔽的危机：法律系统对民间纠纷的吸纳速度，正在系统性地快于民间社会自主消化纠纷能力的恢复速度。当调解的制度化成为法院“诉源治理”的政绩指标，而调解本身又必须经由司法确认才能获得强制执行效力时，一种吊诡的结构浮现了——法律越是“重视”调解，调解就越是变成法律系统内部的一个子程序，而不再是社区、行业、宗教共同体自主维持其内部规范性秩序的一种活着的实践。

这一结构性吊诡并不限于中国。在全球法律多元主义的学术浪潮中，从拉丁美洲的土著司法承认运动，到非洲后冲突地区的习惯法与正式司法体系并置实验，到欧洲的调解指令对成员国司法体系的重塑，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当国家法律体系与民间法、宗教法、行业伦理等多元规范发生接触时，究竟应当以何种制度形态来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承认”“吸收”“多元并存”这些看似中立的学术词汇底下，是否隐藏着一种更为根本的不对称——每一次名为“协调”的制度操作，是否都在改变着各种规范赖以存活的那片土壤本身？

1.2 现有研究的两条主要路径及其盲区

对法律与多元规范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辨认出两条主要路径。第一条路径以自然法传统和当代人权话语为轴心，将协调理解为“向上接道德”：当国家法律与民间法或宗教法发生冲突时，协调意味着国家法向某种更高的道德原则靠拢，或者至少为这种靠拢留下制度空间。这一路径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为法律体系保留了一个超越于主权者意志的正当性来源，但也因此携带了一个盲区：它预设国家法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可被道德灌注的容器，而忽略了每一次“吸收道德”的操作，都可能同时将道德赖以活着的共同体生活形式——那些具体的、依赖于面对面关系和共同记忆的规范实践——转换为抽象的、可被法院援引却不再被共同体成员感知为“自己的法”的法律论证资源。

第二条路径以法律实证主义和系统论法学为代表，将协调理解为“向两边隔离”：法律有自己的符码、程序和正当性生产机制，其他规范有各自的规范性土壤，二者应当保持边界清晰，各自在其管辖领域内运行。这一路径的贡献在于，它承认了法律认知架构的封闭性——法律不可能真正“理解”宗教伦理在信徒心中的那份神圣体验，正如它不可能真正“评价”一个村庄内部调解协议在乡邻关系网络中的实际约束力。然而，它的盲区同样显著：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种“隔离”的话语下，法律对民间法的整合从未停止——每一部民法典的编纂，每一项“公序良俗”条款的司法解释，每一次调解制度的立法化，都在事实上将原本由外部规范自我管辖的领域，纳入法律系统的认知和管辖范围之中。换言之，实证主义的“隔离”描述的不是一种实际状态，而是一种正当性话语——它让法律在不停地“吸收”外部规范的同时，仍然可以宣称自己只是在“承认”或“尊重”他者的自主性。

两条路径看似对立，实则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资格“看”外部规范。无论是以道德的名义去吸收，还是以多元主义的名义去尊重，法律始终保持着观看和评价他者的天然主体地位。这个预设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法律多元主义最激进的倡导者那里——例如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在其对法律多元主义“内在殖民性”的批评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一种“更平等的对话”，而未追问：对话的资格本身，是否需要被对话者去论证？法律在开口说“我尊重你”之前，是否应该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凭什么可以评价你是否值得被尊重？”

1.3 本文的研究问题与核心主张

本文试图从上述预设的根部撬动整个问题域。本文追问的不是“法律应当如何更好地协调其他规范”，而是：在每一次法律与外部规范的具体接触点上，法律是否曾经、并且能否制度性地做出“不看”——即不把自己的认知范畴和评价标准施加于他者——的判断？

这一追问并非空穴来风。在历史的若干关键分叉口上，“管辖克制”——本文用以命名这种“制度性地决定不看”的能力——曾经是一个被认真考虑过的选项。十二世纪博洛尼亚法学家在将罗马法适用于地方习惯时，有人提出过“法官只需确认习惯的存在，而不评价其合理性”；1930年代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在批评司法形式主义时，卢埃林（Karl Llewellyn）曾设想一种法官可以“制度性地表达自己不该管”的程序出口；1990年代世界银行在评估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司法系统时，其2004年的一份内部报告草案中曾包含一条“补充而不替代”条款，后被更主流的“能力建设”话语所取代。这三个时刻，不是孤立的巧合，而是一种被反复埋没的制度基因：每一次，管辖克制的可能都被另一种更强大的制度逻辑——王室集权、司法专业化、发展主义——所碾压，但每一次被碾压之后，它又会在下一个时代、以另一种面目重新浮现。

本文的核心主张是：法律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协调困境，真正的缺口不是法律该做多少，而是法律从未将“该不该不看”这件事，当作一项必须被注意力分配制度所保障、被绩效考核所奖励、被外部共同体所评价的核心司法任务来建设——协调不是在方法的添加中被找到的，是在管辖克制的制度化能力中被丢失的。这一主张不只是一个新的理论命名，而是一个可以在三十年尺度上被严格检验的经验命题。本文将在后半部分给出与这一主张配套的、可被本地学者独立操作的实证检验框架——包括可裁决的对照预测表、可观测的制度代理变量、以及三条可以在实证中“杀死”这一主张的否定路线。

1.4 论文结构概览

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第二节回顾法律多元主义、系统论法学和法律与宗教关系研究三个学术脉络，诊断其共享的“观看资格”预设及其盲区；第三节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从“规范性土壤”和“土壤置换”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发展出“替代品生态”和“共享枯竭”的分析工具；第四节说明本文的概念分析方法与历史制度追溯策略；第五节是全文核心，依次解剖三次历史分叉、四层咬合机制、“管辖不评价协议”作为制度解决方案的完整设计、以及管辖克制能力在当代制度硬约束下的三重屏障与突破路径；第六节以综合讨论的形式回应六种可能的反驳，并在结论部分给出本文的可否定性清单、研究纲领和核心贡献。

2 文献综述

2.1 法律多元主义：从“平行共存”到“内在殖民性”的诊断

法律多元主义作为一个学术传统，其核心贡献在于打破“国家法一元论”的迷思。自1970年代以来，从梅里（Sally Engle Merry）对法律多元主义从“古典”到“新”的类型学划分，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s）将“强法律多元主义”界定为“不是国家法仁慈地允许其他规范存在，而是所有规范在事实上平等共存”的理论宣言，这一传统有力地论证了一个事实：在任何社会中，实际发挥规范性约束力的制度，从来不只是国家制定法。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语境中，土著习惯法在殖民法院体系之外持续运行；在工业化国家，商事习惯法、行业伦理守则和宗教法庭在各自的管辖领域中保持着实质性的纠纷解决能力。

然而，法律多元主义的第二波——以桑托斯和加兰特（Marc Galanter）为代表——揭示了一个更为隐蔽的结构。桑托斯在其对“法律多元主义的认识论暴力”的分析中指出，当国家法以“承认多元”的名义将习惯法纳入自身的认知框架时，它所做的不是平等的对话，而是用自己的认识论标准——什么算“法”、什么算“习惯”、什么算“证据”——去重新定义和筛选其他规范体系中那些可被法律识别的部分。那些无法被翻译为法律术语的部分——例如，一个村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之间未来三代人婚姻关系的隐性约束，或一个宗教共同体中赦免仪式的不可量化的尊严恢复功能——在法律“承认”它的那一刻，被系统地滤掉了。法律多元主义在从“古典”走向“批判”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反：它最初用来揭穿国家法一元论神话的武器，现在被反过来用于揭穿它自己——“承认多元”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更隐蔽的、更不容易被抵抗的认知暴力形式。

然而，这一批判传统在暴露了问题之后，却在一个关键点上停滞了。桑托斯提出的替代方案——“跨文化对话”和“认知正义”——始终停留在规范哲学层面，它无法回答一个制度性的操作问题：如果国家法律体系在认识论上就不可能“公正地”理解其他规范，那么国家

法律体系应当如何行动？它是否应当完全撤出？撤出之后，那些由其他规范管辖的纠纷中的弱势者（妇女、儿童、少数群体），在被共同体内部的压迫性规范所伤害时，其向国家法律求助的路径是否也因此被切断？批判法律多元主义给了我们一个无懈可击的诊断——国家法在“承认”他者的同时也在驯化他者——但它没有给出一个可以在法院立案窗口被操作的具体制度回应。本文正是在这个诊断的终点处展开追问：如果法律在认识论上无法公正地“看”，那么它是否可以在制度上学会“不看”？而这个“不看的制度化”，与桑托斯所批评的那种“国家法傲慢地不干预”之间，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2.2 系统论法学：操作封闭性下的认知盲区及其制度含义

以卢曼（Niklas Luhmann）和托伊布纳（Gunther Teubner）为代表的系统论法学传统，为理解法律系统与其他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套更为精微的分析工具。在卢曼的框架中，法律是一个“操作上封闭、认知上开放”的社会子系统：它只能通过自身内部的合法/非法二元符码来处理信息，外部的道德论证、经济计算、宗教信仰都必须首先被翻译为合法/非法的话语，才能被法律系统“看见”。托伊布纳进一步将这一分析推至法律多元主义的语境：当法律试图“协调”其他规范时，它所做的不是真正去理解那个规范，而是在自己的符码内部为那个规范创造了一个“模拟体”——一个在法律话语中被重新建构的、与外部规范的实际运作已经不同的版本。

这一传统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将认知盲区不是理解为法律的一个缺陷，而是理解为法律之为法律的一个构成性条件：正是因为法律不能直接“看见”道德，它才有一种独立于道德的正当性生产机制；正是因为法律必须把宗教伦理翻译为宪法权利话语才能处理，它才能在现代多元社会中保持一种中立的普遍性。然而，这一分析也携带了一个隐秘的规范性后果：如果认知盲区是构成性的，那么任何试图“改善”法律对外部规范的认知能力的尝试——例如让法官接受人类学训练，或者引入“文化辩护”机制——都只是在法律符码内部创造更精致的模拟体，而非真正突破操作封闭性本身。

本文从系统论法学中继承了两个关键分析工具：其一是“符码翻译的不可逆损耗”概念——每一次从外部规范到法律话语的翻译，都会让外部规范流失一部分无法被法律符码所容纳的隐性知识（那些嵌入在具体人际关系、共同记忆和仪式实践中的规范性体验）；其二是“系统对外部环境的自我模拟”概念——当法律持续地将外部规范翻译为自己的符码时，它逐渐积累起一个关于“外部规范在法律话语中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内部数据集，而不再需要实际地去触碰那个外部规范在真实共同体中的存活状态。这两个工具构成了本文诊断“替代品生态”的理论基础。但是，系统论法学同样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如果法律系统在结构上就不可能公正地“看见”他者，那么它如何在制度上为自己设计一个“不看的义务”？换言之，系统论法学精确地描述了法律为什么不该看，但它没有追问：这个“不该看”本身，能否从一个理论判断转化为一项制度安排——一项被法律系统的内部程序所强制、被绩效体系所识别的、法官在每一个个案接触点上必须执行的自我约束？

2.3 法律与宗教伦理关系研究：从“管辖冲突”到“规范性体验的不可翻译性”

第三条学术脉络来自法律与宗教关系研究。这一领域在表面上处理的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子议题——国家法与宗教法（特别是伊斯兰法、犹太法和天主教教会法）之间的管辖冲突——但其内部从198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向，这一转向对整个“法律与多元规范”问题域有着未竟的理论潜力。

早期研究（如Abdullahi An-Na'im对伊斯兰法与国家法关系的分析，John Witte Jr.对法律与基督教伦理的历史考察）聚焦于“冲突解决方案”的设计：当国家法的某项规则与宗教法的某项诫命发生冲突时，应当通过何种制度机制——宪法豁免、文化辩护、宗教仲裁庭的有限管辖权——来为信徒提供一种不违反其宗教义务的法律空间。这一代研究的核心关怀是保护个体信徒的良心自由，其解决方案的特征是“切割”：在法律的地盘上划分出某些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宗教法的约束力优先于国家法的强制力。

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晚近研究开始转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宗教伦理对信徒的约束力，其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如果宗教法只是一种与国家法平行的“规则体系”，那么切割式的解决方案就是充分的——只要在特定区域内允许宗教规则优先适用，信徒的规范性需求就得到了满足。但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如Talal Asad对宗教作为一种“具身化实践传统”的分析，Saba Mahmood对伊斯兰虔信运动的田野考察）揭示出，宗教伦理对信徒的约束力，并不主要来自“规则内容”本身，而来自一套由国家法无法复制或替代的规范性体验——圣礼共同体的认信、经文诵读的身体实践、忏悔与赦免仪式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将遵守诫命体验为“与神立约”而非“服从外部权威”的那份内在确信。当国家法把宗教伦理当作一套规则来“承认”和“吸纳”时，它恰恰抽走了使宗教伦理成为活着的规范的那个东西——那些无法被规则化、无法被文书化、无法被翻译为法律论证依据的具身化规范体验。

这一转向的理论意涵远远超出了法律与宗教的狭域。它暗示着所有类型的传统规范——民间习惯、行业伦理、甚至一个社区内部关于“好人”标准的隐含共识——其规范性力量的根源，都是一种无法被法律翻译的、嵌入在特定人际关系与共同记忆中的体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任何以“法律吸收民间法”为模型的协调方案，在其实施的那一刻就在阉割它所试图保护的规范。这个判断构成了本文理论框架的一个核心支柱，也构成了本文与法律多元主义和系统论法学对话的主要切入点。

2.4 文献缺口的精确诊断：从“如何协调”到“是否该不看”

综合以上三个学术脉络，可以辨识出一个共享的、尚未被充分追问的缺口。法律多元主义的批判传统揭示了“承认”中的认知暴力，但它停在“应当更平等地对话”的规范哲学层面，没有将“无法公正地看”转化为一项制度设计方案。系统论法学精准地描述了法律为什么在认知上无法公正地看，但它把这个“不看”当作一个描述性事实，而非一个可以被制度要求所强化的规范性义务。法律与宗教关系研究揭示了规范性体验的不可翻译性，但它将这个发现用于论证宗教自由豁免的正当性，而未将其扩展到全部类型的传统规范——也未追问：如果所有活着的规范都依赖于不可翻译的体验，那么法律对所有外部规范的政策，是否都应该从“如何更好地承认”彻底转向“如何在制度上克制自己不去评价”？

本文正是在这个缺口上定位自己的理论贡献。本文不是对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否定，而是将三者各自在理论上已触及、却在制度设计层面尚未推进到底的那一步，推到它的逻辑终点。从法律多元主义那里，本文继承“认识论暴力”的诊断，但将它从批评的武器转换为设计的起点——既然法律“看”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暴力，那么“不看的制度化”就不再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而是一种积极的、需要被程序设计所保障的司法德性。从系统论法学那里，本文继承“操作封闭性下的认知盲区”的分析，但将它从一个描述性概念转变为一个规范性概念——法律系统应当为自身在认知上的无能力，承担制度上的责任，这个责任的具体形式就是管辖克制能力的制度化。从法律与宗教关系研究那里，本文继承“规范性体验不可翻译”的洞见，但将它从个体良心自由的保护，扩展到整个多元规范生态的健康——法律的责任不只是保护信徒不被迫违反教义，而是保护每一种规范赖以存活的那片土壤，不被法律在“承认”它的过程中无意间置换。

3 理论框架

3.1 核心概念：“规范性土壤”与“土壤置换”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基于一个对法律与其他规范关系的重新概念化。本文不使用“规范内容”“规则体系”“管辖边界”等传统术语来描述法律与民间法、宗教伦理、行业伦理之间的关系，而提出一对新的分析概念：规范性土壤，以及土壤置换。

“规范性土壤”指一套规范体系赖以存活——即其规则对共同体成员产生可被感知的、不依赖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实际约束力——的那些条件。它不是规范的内容本身，而是规范内容得以被共同体成员体验为“对我们有约束力的东西”的社会基础。法律的规范性土壤由程序—暴力的正当性生产机制构成：一部制定法之所以对公民产生约束力，最终依赖于一个链条——立法程序的合规性、司法裁判的可强制执行性、执法机关对暴力手段的合法垄断、以及公民对这一链条的整体合法性所持有的接受（无论这种接受是基于认同、习惯还是无奈）。民间法的规范性土壤则由稠密人际关系与共同记忆的活联结构成：一个村庄的“规矩”之所以对村民有约束力，不是因为它在成文法中被授权，而是因为遵守它会被乡邻视为“懂规矩的人”，而违反它会失去在共同体中的体面、合作机会和代际联姻的可能性。宗教伦理的规范性土壤依赖圣礼共同体的认信与具身化实践——信徒遵守诫命不是因为被惩罚的恐惧（虽然某些宗教传统中确有这一层），而是因为遵守被体验为“在信仰中活着”的一部分，违反则伴随着一种无法被外部观察者所测量的内在疏离感。行业伦理的规范性土壤依赖同行评价与职业身份的荣誉机制——一个医生遵守医学伦理守则，不是因为卫生行政部门可能吊销其执照（虽然这是最后一道防线），而是因为违反会在同行中被视为“不配做这个”，丧失转诊、合作、师承和职业声誉的隐性资源。

“土壤置换”则指这样一个隐蔽的过程：当法律以“吸收”“承认”“制度化”为名，将其他规范的某些内容纳入自身的管辖范围时，它不可逆地用自己的规范性土壤——程序—暴力——去替换了那些规范原本赖以存活的土壤——稠密关系、认信体验、同行荣誉。每一次以“立法吸收习惯”为名的操作，都把一种依赖乡邻评价的活联结的约束力，替换为一种依赖法院执行的远程约束力；每一次以“公序良俗”条款援引民间道德为依据的司法裁判，都把一种嵌入在具体的、面对面人际网络中的规范性体验，替换为一种可以被法官在判决书中引用和解释的抽象话语；每一次将行业伦理准则“升格”为行政法规，都把一种依赖同行共同体内部荣誉感的自我约束，替换为一种依赖行政处罚威慑的外部服从。被替换后的规范，在纸面上可能更为“有力”——它有国家暴力为后盾——但在它原本的共同体内部，它逐渐失去了那种让人发自内心的“觉得应该遵守”而非“算了省得麻烦”的规范性体验。被置换的土壤，像一片被从溪流边移到水泥盆里的植物：它不会立刻死，但它根部的自我供养能力已经被切断了，从此它的存活与否，取决于水泥盆的主人是否记得浇水。

3.2 “替代品生态”与“共享枯竭”：从诊断到稳态

当土壤置换持续不断地在多个领域（民商事立法、纠纷解决、行业规制、宗教事务管理）中发生时，法律系统与外部规范体系之间就不再是“协调者与被协调者”的关系，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本文称为替代品生态的自维持形态。在这个形态中，法律不再是外部规范的对话者，而成为一个用程序—暴力土壤批量生产替代品的制度机器。这个机器的输入端，是各种活着的规范实践——一个村庄的调解习惯、一个行业的职业伦理、一个宗教团体的内部纪律；这个机器的输出端，是那些被法律符号翻译后的标准化替代品——司法调解书上盖了法院公章的协议、行政法规中定义了“违规行为”的条款、宪法判例中“宗教自由”的权利话语。

替代品生态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能够在不真正解决协调需求的前提下，持续地运转下去。它的运转依靠三重建构：第一，它有一种“万能容器”——公序良俗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等一般性条款，可以把任何类型的外部规范诉求转化为法律内部的评价依据，而无须实际考量那个外部规范在共同体中的存活状态；第二，它有一套“管辖权回收机制”——调解、仲裁、行政裁决的最终效力必

须以司法确认为前提，这使得法律在任何外部规范介入纠纷解决的流程中，始终占据着终局的守门人位置；第三，它有一组“叙事舒适区”——学术话语中“法律多元”的被频繁援引，让法律系统可以在每一次实际收紧管辖权边界时，仍然在纸面上宣称自己在“尊重多元”“推进诉源治理”“激活社会自我调节能力”。这三重建构相互支撑，形成一个闭合的反馈环：每一次协调诉求的涌入，都被这个生态消化为替代品的批量生产，而每一次替代品的生产，又进一步强化了法律对那个领域的管辖合法性——“法院一直在处理这类纠纷，说明法院对这类纠纷有管辖权”，这个循环论证一旦嵌入制度运作，就不再需要一个独立的正当性来源来为其辩护。

替代品生态运行足够久——在本文所追溯的长时段历史中，这一过程持续了至少九个世纪——之后，法律与外部规范之间的关系，抵达了一个更深的稳态。本文称之为共享枯竭：在法律与外部规范的关系中，双方各自失去了独立生产并维持规范性体验的能力，但彼此的虚弱是互相咬合的，就像两堵正在倾斜的墙互相倚靠而都没有倒下。法律的正当性在持续流失中——司法公信力下降、判决执行率走低、社会对“法院管不管用”的普遍不信任；与此同时，民间法、宗教伦理和行业伦理的约束力也在持续流失中——村庄的规矩对新一代外出务工的村民不再有约束力，宗教戒律对世俗化的信徒不再是生活秩序的核心，行业伦理在市场逻辑的碾压下沦为挂在办公室墙上的装饰性准则。法律把外部规范的衰落归咎于“传统社会的解体”——就像一个人把自己邻居房子的倒塌归咎于那房子自己质量不好，却从不承认自己在每一次接过那个房子的维修工作时，都用自己不匹配的材料替换了对方原本的榫卯。外部规范则把法律的正当性危机归咎于“法律脱离了人情”——就像那个邻居抱怨来人修得不好，却没有意识到他失去的不是一个维修工，而是自己修房子的手艺本身。

共享枯竭作为一种稳态，其最致命之处在于它对修复努力的免疫力。任何试图改善现状的制度创新——例如当前中国大力推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都必须通过已有的替代品生态来实施。改革的推动者是法院，改革的执行者是法官，改革的考核指标是调解分流率、司法确认率这些被法院内部绩效体系所定义、所统计、所上报的数字。而共享枯竭的四层咬合机制——缝合性语言的制度化、管辖权的仪式性释放、绩效体系的双向压制、可感知正当性的相互卸责——会将任何改革的能量，最终导入对枯竭本身的新一轮加固。改革的纸面数字上升了，但土壤层面外部规范的自救能力进一步萎缩了，而法官对改革工具化的惯性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不是改革的失败，而是改革在根本上的不可能：它试图用一个内置了置换基因的制度机器，去修复由那个机器的持续置换所造成的生态损伤。

3.3 跨学科理论资源的调用及其有效边界

本文在建构上述理论框架时，选择性地调用了三个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并对其类比有效性做出严格限定。

第一个资源来自免疫学中的“自身免疫”概念。在免疫学中，自身免疫疾病不是免疫系统对外部病原的攻击不力，而是免疫系统错误地将机体自身的健康组织识别为威胁并加以攻击——它的防御行为导致了机体的自我伤害。本文借用来描述替代品生态的工作机制：法律系统对外部规范秩序的每一次“防御性干预”（以保护当事人权利、防止纠纷扩大、维护社会秩序为名），都无意中削弱了外部规范自我维持的能力，使得该规范在下一轮纠纷中更难自行运作，进而产生更多的“需要被法律干预”的信号，触发新一轮的干预。这不是一个巧合的副作用，而是替代品生态的结构性特征：它自己制造着它声称要去解决的那些需求。然而，这一类比必须被严格限定：生物免疫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在三个关键维度上不可类比——生物免疫系统是一个演化形成的、无主体的生理机制，而法律系统是一套由人类制度设计、政治谈判和组织利益驱动的社会建构；自身免疫疾病在生理上可以被药物干预所逆转，而替代品生态的逆转需要的是制度骨架的重塑，不是外部的“药物”注入；更重要的是，生物机体有一个可以被客观定义的整体健康状态，而“多元规范生态的健康”本身是一个需要被规范的、无法中立的规范性判断——谁有资格来定义某一片土壤是否“健康”？这个判断本身，是不是另一个版本的认知暴力？本文在借用免疫学概念时，仅取其“防御行为导致自我伤害”这一结构性类比，而不将法律系统看作一个可被类比为生物机体的有机整体。

第二个资源来自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锁闭”。布莱恩（Brian Arthur）和诺斯（Douglass North）等学者在分析技术演进和制度变迁时揭示，历史上的某些时刻存在着多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而一旦某种制度安排因为偶然因素或短期利益被选定，它会通过递增回报效应不断强化自身，最终将其他曾经可被选择的路径封闭掉——不是那些路径被证明为不可行，而是它们从制度景观中消失了，不再被后来的行动者视为可选项。本文在追溯十二世纪以来法律系统整合其他规范的历史时，严格援用这一分析框架：每一个历史分叉口——习惯法是否需要经过王室法官的“合理性”审查才能被适用、宗教法庭的婚姻管辖权是否应当由世俗法院接管、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是否应当“升格”为国家法律——都曾经存在过不止一个可能的制度选择，而每一次被选择的那个方案，通过三个世纪的制度加固，将那些未被选择的方案锁死在“从未存在过”的集体记忆之外。这一类比的有效性不存在根本的界限，因为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材料（习惯法、教会法庭、行会制度）本身就是制度变迁研究的典型对象。但本文在关键的一点上与路径依赖经典理论保持距离：诺斯等人倾向于认为，制度锁闭是因为现有的制度安排为大多数行动者提供了优于其他替代方案的收益，而本文揭示的是，替代品生态的锁闭不需要提供“更优”的收益——它只需要为法律系统内部的关键位置（法官、立法者、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足以让他们无需面对“我究竟该不该管”这一麻烦问题的认知捷径，就足以自我维持。这个差异将在后文的讨论中进一步澄清。

第三个资源来自组织行为学中的“注意力分配”理论。西蒙（Herbert Simon）和奥卡西奥（William Ocasio）等学者论证了一个关键的制度事实：在任何一个复杂组织中，决策者的核心稀缺资源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组织通过设立议程、绩效考核标准、信息筛选机制等结构性安排，来决定哪些问题被纳入决策者的注意范围，哪些问题被系统性地忽略。本文在分析替代品生态中法官的行为驱动力时，严格适用这一理论：法官在接到一件可能涉及民间法或行业伦理的纠纷时，其第一反应不是“我应该怎么更好地协调”，而是“我应该把这件案子吸收进来、用司法程序消化掉”——不因为任何一条实体法规则要求他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审限压力、结案率考

核、上诉率指标、信访风险)使得“不碰它”比“碰它”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承担更大的职业风险。管辖克制的核心困难,因此不是法官不知道“不该管”,而是现行的注意力分配制度,使得法官没有制度上的理由去把注意力花在“我该不该管”这个问题上。本文对这一理论的挪用非常克制:注意力分配只能解释管辖克制的“行为驱动力缺失”这一侧,不能解释管辖克制的“制度合法性”这一侧——后者必须回到法哲学和宪法理论中去寻找支撑。

3.4 核心命题

基于以上分析工具,本文提出三个层级递进的核心命题:

命题一(结构性命题):法律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关系,当前所是真实形态,不是学界通说所假设的“多元规范在摩擦中寻求协调”,而是一种本文称为“共享枯竭”的稳态——在这一稳态中,双方各自失去了独立产生和维持规范性体验的能力,但彼此的虚弱是互相咬合的,且这一稳态拥有一套完整的自我维持机制(替代品生态),使其对改变自身的尝试具有系统性免疫力。

命题二(操作性命题):破除共享枯竭的突破口,不是任何一个旨在“改善法律协调能力”的新制度,而是法律系统在个案接触点上获得一种能力——本文称为“管辖克制能力”——即制度性地决定自己不评价、不转化、不回收外部规范的管辖权。这一能力的建设,需要法律系统在其注意力分配制度中,为“判断自己是否该看”这个动作,与“判断自己该怎么看”同样分配权重、程序和绩效激励。

命题三(实证性命题——可被检验或证伪):如果在三年内,有至少一个试点法院将“管辖克制率”——以法院声明“本院不予评价其他规范的实体内容”结案的案件比例——作为一个独立指标纳入法官绩效考核,并且该法院在五年后的当事人满意度、管辖权适当性评价和外部规范共同体自我修复能力三个维度上,显著优于未将该指标纳入考核的对照组法院,则命题二在经验上成立;如果在同等条件下,试点法院在以上三个维度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或虽在纸面上表现出差异但其管辖克制实质上蜕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推案”——即法官以管辖克制为名,将本应由法院管辖的案件也推给不具充分管辖能力的外部规范体系——则命题二在经验上被推翻。

4 方法论

4.1 研究设计与分析策略

本文采用概念分析与历史制度追溯相结合的方法论路径。这一路径的选择,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本文试图重新概念化“法律与多元规范之关系”这一法哲学母题,这需要一种能够从既有学术话语中切出新的辨别维度的概念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本文的核心主张——管辖克制的制度化是嵌套在长时段历史路径之中的一个被反复埋没的旧可能——要求一种能够追踪制度在关键历史分叉口上的抉择与锁闭过程的历史制度分析方法。

概念分析的任务不是对既有学术话语进行综合或分类,而是识别那个被共享预设所遮蔽的“看不见的选项”。在本文中,这个看不见的选项就是“不看的制度化”。法律多元主义、系统论法学和法律与宗教关系研究三者,各以自己的方式论证了法律在认知上无法公正地“看”外部规范;但它们都没有完成下一步:将“不该看”从理论诊断推进到制度设计。本文的概念分析策略正是从这一步展开——它在既有学术传统共享的预设底部(“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资格看外部规范”)撬开一个裂隙,将“不看的义务”作为一个独立的操作性概念从中拉出,并在后续的分析章节中将其发展为可被制度设计所承载的“管辖克制能力”。

历史制度追溯的任务,是验证管辖克制能力不是本文的一个纯粹规范构想,而是一条曾经在历史上被认真考虑过的、后来被其他制度逻辑所锁死的旧路径。本文通过对三个关键历史分叉口的追溯——十二世纪罗马法对地方习惯的“合理性审查”、十六世纪世俗法院对教会法庭管辖权的接管、十九世纪国家法规对行业伦理的“升格”——展示了被选择的方案(法律的管辖权不断扩展,外部规范被不断转化为法律内部的子类)如何通过制度加固,将那个未被选择的方案(法律确认外部规范的存在并让渡管辖权)从后续的制度景观中抹除。这三个分叉口的选择不是基于任意或偶然的理由;每一次,被锁闭的方案都以与国家建构、司法专业化和法治统一的强势逻辑不可调和为由而被放弃。本文的历史追溯不是全面的法律史研究,它只萃取三个节点中与核心论证直接相关的那一层:在每一个节点上,管辖克制的制度可能是否曾经在场,它被放弃的具体逻辑是什么,以及这个放弃本身如何在后续的制度安排中被固化为一套不可被挑战的默认状态。

4.2 跨学科类比的选择标准

本文在理论框架中调用了免疫学、演化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三者中的具体概念。这些调用的选择标准不是“该学科是否有权威性”或“该概念是否听起来有启发性”,而是三条严格的实质咬合标准:

其一,类比源学科的概念所描述的那个结构性关系,必须在目标学科——法律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关系——中有一个可被指认的同构体。自身免疫概念在免疫学中描述的关系是“防御机制错误地攻击自身组织导致自我伤害”,在法律与多元规范关系中,这个关系被严格同构为“法律系统在防御性地干预外部规范时,系统地削弱了外部规范的自我维持能力,进而产生更多的干预需求”。这一同构关系在本

文中不是隐喻，而是一个可以在经验中被检验的命题——如果法律对某个村庄的民间调解的“支持性介入”（如提供调解员培训、将调解协议与司法确认挂钩）在三年后显著降低了该村庄自主发起调解的频率，而提高了村民“有事找法院”的直接诉讼率，那么这个命题就在那个村庄中被证实；如果数据没有显示这个效果，则该类比在该特定语境下的适用性被否定。

其二，类比源学科的概念必须为目标学科的分析提供一个操作性的变量，而非仅仅一种启发性的想象。注意力分配理论被适用，是因为它在组织行为学中已经被发展为一个包含可测量的变量（如决策者的时间分配、议程设置中的议题排序、信息筛选机制的过滤标准）的经验概念，而本文可以将它转化为法律系统内部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法官的注意力分配结构（结案率考核、审限压力、上诉风险、信访压力）中，是否存在一个“管辖克制行为”的制度激励缺口？这个缺口可以通过将“管辖克制率”纳入绩效考核这一操作来被干预吗？如果这个干预发生了，法官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

其三，类比的有效边界必须在调用时被显式陈述。本文在引介每一个跨学科概念时，都明确指出了该概念在从源学科迁移至目标学科时所丧失的维度（例如，免疫学概念中预设的可客观定义的机体“健康”状态，在法律适用中是一个高度规范性的、需要被政治决定的问题），并限制该概念仅在其同构关系成立的那一侧被使用，而不被扩展到那些不可迁移的维度。

4.3 方法局限的预先承认

本文在方法论上面临三个不可回避的局限。

第一，概念分析所能完成的，是从既有学术话语的预设中切出新的辨别维度，并为这一维度提供初步的制度设计草图；但它无法独立证明这一制度设计在现实中的可实现性。本文在第五节中为管辖克制能力提供了详细的程序工艺包（管辖不评价协议、绩效对接、养护约束），这些设计在逻辑上自洽，但它们的实际运转取决于一系列外生于本文分析的制度条件——政治意志、财政资源配置、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接受程度——这些条件是否会被满足，超出了概念分析本身的论证范围。本文对此局限的回应是：在第六节中，本文将给出一个可以在三十年尺度上被独立检验的实证框架，使本文的核心主张不依赖于本文对自己论证质量的信心，而依赖于它在未来三十年中被任何外部研究者用本文提供的五条锚点去检验或否证的结果。如果五条锚点中的三条在实证中被否证，本文的核心主张就被推翻，而本文的后半部分（制度设计）即便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也将因此被判定为不可行的空想。

第二，历史制度追溯的材料选择受到两个限制。其一是语言限制：本文所追溯的三个历史分叉口中的第一手档案——十二世纪博洛尼亚的注释法学派手稿、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各国教会法庭的管辖权谈判记录、十九世纪欧洲各国行会制度改革的立法辩论纪要——绝大部分以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书写，本文依赖的是二次文献中的权威研究，而非对一手档案的直接解读。其二，本文所选的三个分叉口全部来自欧洲法律史，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盲区：在伊斯兰法系、非洲习惯法体系、东亚儒家法文化传统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被反复埋没的管辖克制制度基因？如果存在，它们的形态、被锁闭的逻辑和可被重新激活的条件，是否与欧洲传统中的路径截然不同？这些问题的回答超出了本文的历史追溯范围。本文对此的处理是：在第六章“未来研究方向”中，将“管辖克制能力的比较法考古”列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并在其中设计了可操作的比较法研究方案。

第三，全文的论证聚焦在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和经验性的实证框架之间，没有独立的经验材料（如田野调查数据、法官访谈记录、立法过程追踪）作为支撑。本文是一项理论建构和制度构想工作，它的经验锚点不是“本文已经证明了管辖克制在现实中有效”，而是“本文给出了一套可以被任何外部研究者用标准实证方法去检验管辖克制是否有效的完整框架”。这个自我定位意味着，本文的成功与否，不取决于读者是否被本文的理论论证所说服，而取决于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是否有人按照本文给出的实证框架去做了那个检验。这一极端的可证伪性前置，是本文在方法论上的最核心选择：本文不寻求让自己变得无懈可击，而是主动画出自己被杀死的最可能的那几条路。

5 分析与讨论

5.1 被埋没的旧路：三次历史分叉中的管辖克制之可能及其封闭

将管辖克制能力从规范构想转化为制度可能的第一步，是确认它曾经在历史上被认真对待过。本节追溯三个关键制度分叉口，不试图穷尽每个时刻的全部历史细节，而是萃取同一层结构：在每一个分叉口上，让外部规范自己管（即法律不将其同化为法律内部的一个子类）的制度基因曾经在场，但每一次都被另一种更强大的制度逻辑所碾碎——这种碾碎不是通过公开的辩论和否决，而是通过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它在制度设计的早期阶段，就被排除在“可被考虑的方案”的清单之外，此后连“它曾被考虑过”这件事本身也被遗忘了。

第一分叉：十二世纪罗马法再发现与习惯法的合理性审查

十二世纪，博洛尼亚法学家在重新发现和注释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过程中，面临一个此前欧洲法律实践中不曾被系统化的问题：当罗马法中的抽象概念（如“善意”“公平”“理性”）与数百年来在各地被遵守的、千姿百态的习惯法规则发生冲突时，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决定习惯是否应当被王室法院适用？注释法学派的主流回答——后来被意大利学派的巴托鲁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进一步系统化——是：法官有权审查习惯的“合理性”，只有被判定为“合理的”习惯，才能够被法院承认为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合理性审查”的

发明，在当时的智识语境下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创新：它赋予了世俗君主和受罗马法训练的法官们一个概念工具，让他们能够对地方封建主的习惯法管辖权进行系统的拆解。从王室集权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进步——它使王室的统一法令得以逐渐取代地方习惯的各自为政。

但是，被这个制度选择所碾压的那个方案，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在十二世纪中后期，有一批法学家——他们留下的文本大多不完整，且长期被注释法学派的主流叙事所遮蔽——曾经提出过一个不同的方案：法官在遇到当事人援引地方习惯时，其职责仅限于确认“该习惯在该地方是否确实被作为活着的规则而遵守”，而不对该习惯的实质内容做出“合理/不合理”的法律评价；在确认该习惯仍然存活之后，法院应当将基于该习惯的纠纷发回当地的共同体内部自行处理，或者至少在裁判中不对该习惯的实质内容加以评价。这一脉的论证基础不是“尊重文化多元”的现代观念，而是一个更为实际的制度判断：在缺乏现代官僚体系、警察力量和统一司法行政体系的中世纪，王室法院根本没有能力去实际了解每个地方的习惯究竟如何运作；法官在远离习惯运行现场的城市法院里对“合理性”做出的判断，是基于对那个习惯的不完整了解做出的，这种判断本身就是不可靠的。

这一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不是因为它被论证为错误，而是因为它与两股正在兴起的强势逻辑不可调和：一股是教皇革命后教会法和罗马法共同推动的“一个统一的、理性化的法律秩序”的理想——在这个理想中，习惯法只是尚未被理性化的原始法律，它的终点是被成熟的罗马法所吸收和取代；另一股是世俗君主通过控制法院系统来扩张其相对于地方封建主的管辖权力的政治需求。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使得那个“让习惯自己管”的方案，在尚未进入制度设计正式议程之前就已经被排除了。而当十二世纪的注释法学派将“只有被法官审查为合理的习惯才配被适用”写入标准教科书之后，这个方案就从一个曾经被认真考虑的选择，变成了一个不可想象的事物——此后的法学家，不再问“法官有没有权审查习惯的合理性”，只问“合理性审查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第二分叉：十六至十七世纪世俗法院对教会法庭管辖权的接管

宗教改革在十六世纪的快速推进，带来了一个在法律史上深远但经常被忽视的制度后果：当新教各邦的君主废除教皇在世俗领土上的司法管辖权时，他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些原本由教会法庭管辖的事务（婚姻的有效性、遗嘱的誓约效力、教士的纪律惩戒），现在应该由谁来管？答案几乎是自动达成的：世俗法院借机接管了这些管辖权。这一接管被后人视为国家主权对教会特权的胜利——一种进步的叙事。但这个叙事下面，掩盖着一段更为复杂的制度交易。

在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早期宗教改革中，一些改革派神学家和法学家曾设想过一个与“世俗法院全盘接管”截然不同的制度方案：世俗政权不废除教会对其内部事务的管辖权，但将其从“与国家法平行的强制管辖”改为“一种由信徒自愿选择进入的、其效力依赖于认信而非强制执行信仰秩序的”。在这个方案下，国家法律不再把宗教法庭的裁决翻译为可被世俗强制力执行的判决，但也不禁止信徒在自愿的前提下将纠纷提交宗教法庭；宗教法庭的裁决对信徒的约束力，不是来自国家法的授权——国家法明确不干预——而是来自信徒自愿将其作为信仰实践的一部分去接受的那份内在约束。

这个方案从未在任何主要的新教国家中被制度化。原因复杂，但核心驱动与上一个分叉中的逻辑大致相似：在宗教战争和教派冲突的血腥现实中，国家主权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垄断暴力和司法管辖权，而“允许一个不依赖国家授权的管辖空间存在”——即使它是纯粹自愿的——在当时的政治想象中，等同于允许一个不受主权控制的权力中心存在。更重要的是，世俗法院在接管教廷管辖权时，不仅接管了案件，还在同一操作中接管了管辖权的正当性基础：以前是“因为教皇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所以他对信徒的婚姻有管辖权”，现在是“因为主权国家的法律定义了婚姻的成立要件，所以国家法院对婚姻纠纷有管辖权”。管辖的基础被替换了，但这个替换本身没有被当作一个问题——它被当作主权国家自然应有之权，而此后任何关于“宗教法庭是否应当保留其独立管辖权”的讨论，都不再被认真对待，因为那等于在问“主权是否可以被分割”。

这个分叉中被碾压的方案，对于本文的核心论证而言具有特殊的分量。它展示了管辖克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不是法律“赋予”其他规范体系管辖权，而是法律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赋予——因为那些规范的管辖权来源并不依赖于法律的授权，而是独立于法律而存在的（对信徒而言，教会法庭的管辖权来自信仰；对行会成员而言，行业伦理的管辖权来自职业身份；对村民而言，规矩的管辖权来自世代居住的村庄共同体）。法律在此处的克制，不是一种恩赐给出去的“准许”，而是一种对自己无能的承认——“我无法真正评价你的规范，因为我的评价标准来自一块与你无关的土地”。

第三分叉：十九世纪行业伦理从自治到国家法规的“升格”

十九世纪，随着职业资格制度在各欧洲国家逐步建立，中世纪以来由行会自治维持的行业伦理，经历了一次系统性的法律“升格”——那些原本只能在行业内通过同行评价、荣誉丧失、开除会籍等方式来执行的职业守则，被逐步吸纳进国家制定法中，成为可以被行政处罚、民事诉讼甚至刑事惩罚所强制执行的“职业义务”。这个过程的典型样本，是英国在1858年《医疗法》中将此前由皇家医学院、药剂师协会等专业团体自我维持的职业伦理标准，转化为由医学总会法定委员会进行调查和惩戒的法定标准；以及法国在19世纪末将此前由各地行会自行维护的工匠资格认证和商业习惯，纳入《商法典》和行政规章的管辖范围。

被这个“升格”所碾压的那个方案，不是保留中世纪行会制度本身——这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统一民族市场面前是不可能的，那些制度本身也带有严格的等级排他性。被埋没的制度基因，是一种替代性的升格路径：在明确某些行业伦理内容必须被国家法规所统一规定（如公共卫生和安全领域）的同时，为其他领域保留一种不被国家法规所置换的自治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行业伦理不被翻译为法律义务，

而继续作为行业内部的荣誉规范而存在，违反它的后果不是法律的惩罚，而是同行的不承认，且法律体系在遇到这类纯粹属于行业内部荣誉规范的纠纷时，明确声明不予管辖。这一路径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一些行业立法辩论中确曾出现（例如英国关于律师职业操守是否应由议会立法还是由出庭律师公会自我规制的长期辩论），但最终在几乎每一个主要行业（医疗、法律、工程、会计）中输给了“统一法规”的逻辑。

输掉的原因，与前述两个分叉中的逻辑一样，不是管辖克制的方案被论证为不可行，而是另一种更强势的、被不可反思地视为“进步”的制度逻辑——在这个案例中是国家对公民安全的保护义务，以及统一市场对标准化职业服务的需求——不允许它的存在。而当“职业伦理=国家法规”这一等式在十九世纪被制度化之后，它就从一种可以被挑战的制度安排，变成了一套其反方向不可想象的认知默认态：今天的法律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会几乎自动地将其分类为需要由卫生行政法、侵权法或刑法来处理的问题，而不会去问：这个纠纷中是不是有一层——仅仅是那一层——关乎同行的荣誉评价，而这一层不应由法律去碰？

5.2 替代品生态如何锁死路径：四层咬合与系统性免疫

三次历史分叉中被反复碾压的那个管辖克制的制度基因，其不可逆性——即在当代为何如此难以被重新激活——不能仅用“历史上它输了”来解释。历史上曾经输掉的方案很多，其中不少在后来的制度变革中被重新拾起（如陪审团制度在历经多个世纪的萎缩后，在二十世纪晚期部分国家重新扩大适用）。管辖克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的锁死不是某一条法律规则或某一项制度安排造成的，而是四层相互咬合的机制，共同构成一个对任何试图解锁它的尝试都具有免疫力的稳态。本节分别解剖这四层咬合。

第一层咬合：缝合性语言的制度化

“公序良俗”是这一咬合的典型样本。这个从《法国民法典》第6条经由《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和《瑞士民法典》第2条传到二十世纪中国民法的概念，在每一次被法官援引时，都同时完成两个完全相反的操作：向法律共同体内部，法官用“公序良俗”将一项外部规范（如“买卖不得破租赁”的民间习惯、或“嫁出去的女儿不参与继承”的宗族规则）翻译为一个法律内部的评价依据——外部规范本身不再是裁判的理由，它已经被“公序良俗”这个概念所吸收、过滤、重新包装为一个法律论证的要素；向外部规范所在的共同体，法官则用“尊重善良风俗”这一道德措辞，让当事人和社区产生一种错觉——法律在尊重他们的规矩。这两个操作同时进行，使得每一次法官援引公序良俗时，都发生了双重的土壤效应：在法律这一侧，“公序良俗”条款不断扩张其内容的范围，将越来越多的外部规范吸纳为法律论证的素材；在外部规范那一侧，那个规范本身在被法律“承认”之后，逐渐失去在共同体内部独立运行的动力——因为“上法院说理”和“在村里论理”的规范性土壤是不同的，前者依赖律师和证据，后者依赖人际关系和记忆，当纠纷的当事人发现同一件事可以在法院用法律话语说出来并且执行得更稳时，他们就越来越少地在村里用村规来解决它，久而久之，规本身就没有人再使用了，它成了一个被写在纸上的死的传统。

更隐蔽的是，缝合性语言不只是法官无意识使用的一种话语工具——它已经被制度化了。当一个法官在判决书中援引公序良俗时，他无需交代“我援引的是这一特定社区的实际运行的善良风俗的哪些具体内容”，也无需证明“这个风俗在被当事人援引时仍然是活着的”——他只需引用法条和此前上级法院对公序良俗的司法解释即可。这使得公序良俗条款成为一个万能容器：它可以装进任何类型的传统规范诉求，而无需法官做任何关于该规范是否仍然存活、在什么范围内存活、其存活所依赖的土壤是否健康的事实调查。容器本身不会枯竭——因为它的内容可以在不增加任何外部成本的前提下被不断更新，只需写一篇新的司法解释；而被装进容器的那个具体的规范实践，则在被“承认”的那一刻，被切断了它与生成它的那片土壤之间的营养输送管道，从此它的生命力不再来自它在乡邻关系中的实际运行，而来自它在法院判决书中被援引的频率。

第二层咬合：管辖权的仪式性释放

当代法律制度中充斥着为外部规范“留出空间”的制度安排：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被《人民调解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所“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宗教团体可以依据其内部规章管理其成员。这是“管辖权释放”的一面——法律在纸面上大量地说“这些事项你们可以自己管”。但这些释放，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嵌入了“仪式性”的特征：法律在每一个释放空间的出口，都设置了一个需要法律审查才能生效的关卡。调解协议如果要获得强制执行，必须经过司法确认；仲裁裁决如果在执行阶段被挑战，法院有权审查其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宗教团体的内部管理行为如果涉诉至法院，法院会以“审查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法律”为由进行实质审查。

这种“仪式性释放”对替代品生态的维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让法律系统既可以向社会宣称“我们鼓励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又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外部规范能够在不经过法律系统最终守门的情况下，独立地完成一个有终局强制力的管辖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向法律系统内部（特别是法官群体）发送了一个清晰的、不需要被写入任何条文、却比条文更有效的信号：允许外部规范“参与进来”，但你（法官）是最终的守门人。如果你在某个案件中把守门人的角色让渡了——即你确认了那个外部的管辖行为不需要经过你的审查——你并没有做任何一件被制度所鼓励的事情；制度在纸面上没有禁止你这样做，但制度在它所不统计、所不奖励、所不记录的沉默中，已经告诉你：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万一那个外部管辖行为后来出了事（比如调解协议的某一方当事人后来反悔，来法院闹访），你当初的“不审查”会成为你被追究的那个点。因此，理性的法官在这个结构下选择的不是“不审查”，而是“做一次轻度的、过程性的审查，然后在调解协议上盖个章”——既满足了纸面上的仪式性要求，又保护了自己不因“不审查”而成为被追责的对象。而在这个过程中，外部

规范的自治性，已经在那个轻度的审查中，被悄无声息地移交了。

第三层咬合:绩效体系的双向压制

当代中国法官的绩效考核体系，是一套高度精细化的、以数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管理工具。在这个体系中，结案率、调解率、上诉率、发改率、信访投诉率等指标，共同构成一个法官在其职业生涯中必须持续回应的激励结构。管辖克制——即法官在某个案件中决定不将该案件纳入司法程序、或者决定不对某个外部规范的内容进行法律评价——在这个绩效体系中，并不作为一个正向行为而被识别。相反，它被以两种方式反向压制。

其一，“收案—处理—结案”的流水线惯性。法院的管理逻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倾向于将每一件进入法院立案窗口的纠纷，看作一个“需要被司法程序所处理”的单元。立案审查制的改革（从立案审查制到立案登记制）虽然在纸面上减少了法院拒绝受理案件的门槛，但在实践中强化了另一重效应:案件只要进了门，就必须走完一个司法流程才能出去。这个惯性使得“法院受理后发现这个案子更适合由其他规范体系去管、因此主动让渡管辖权”这一操作，在法院当前的行政管理流程中没有标准化的程序接口——立案系统没有“管辖不评价”这个结案方式，审判管理系统没有“让渡管辖权”这个统计类别，档案系统没有“未进入实质审理、已移交外部有效管辖”这个归档编码。

其二，信访风险评估对法官行为的隐性塑造。在当前中国的司法行政生态中，信访风险——特别是涉及群体性事件或可能引发媒体关注的敏感案件——是影响法官行为的一个实质性变量。当一个法官面临一件涉宗教伦理或涉少数民族习惯的案件时，对其进行管辖克制（即“本院不予评价该规范的实体内容”）的风险，在于这一决定在当事人眼中可能被解读为“法院不管”——不管这个词在中国当前的法治话语中带有强烈的负面意涵，它很容易被上访的当事人转化为“法院渎职”的指控。相比之下，法院将这些案件吸入自己的程序——调解、听证、做工作、最后以当事人撤诉或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结案——虽然在实质上可能同样未能解决问题，但在纸面上它是一个“法院积极作为”的过程，在信访追责的逻辑下风险要小得多。结果就是:在法律系统内部理性的、风险趋避的个体法官眼中，管辖克制不是一个被禁止的错误，而是根本不是一个被系统所承认的操作选项——它不仅没有被鼓励，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壳去承载它。要做管辖克制，一个法官必须同时在法理上论证自己为什么“不评价”，在行政上找到一个可以归档的结案方式，在绩效考核上承受“收案但不产生结案”可能拉低本人数据的后果，并在信访风险上独自承担那个被当事人指责为“法院不管”的后果——这四项成本加在一起，足以使任何理性的个体法官不去碰这个选项。

第四层咬合:可感知正当性的相互卸责

前三层咬合分别从话语、制度程序和绩效激励三个层面，将替代品生态锁死。第四层咬合则从“正当性体验”的维度，为其提供了一个最终的、也是最具韧性的自我免疫机制。

如前所述，共享枯竭的稳态下，法律与外部规范各自的正当性都在流失。但这一流失本身，反而成为了双方自我维持的一个隐蔽资源:法律体系可以将其公信力的下降，归咎于“外部规范的约束力衰退导致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一种被广泛传播的、在司法行政报告中被反复使用的叙事，是“人民调解的弱化导致法院案件激增”；而民间法、宗教伦理和行业伦理则可以将自身的衰弱，归咎于“法律管得太宽导致人的自觉性被管没了”——一种在民间同样流行的、在乡村的闲话中和行业的私下抱怨中被反复传播的叙事，是“现在的人都讲法律不讲规矩了，所以规矩就没人守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叙事，在各自的共同体内都发挥着辩解作用:法律人用外部规范的衰弱来解释自己的不胜任，民间人用法律的扩张来解释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由于双方几乎没有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对质的制度机会——法官不参加村庄的调解复盘，村长不参加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这两种叙事可以在互不接触的情况下各自持续再生产，而不必面对它们并列在一起时所呈现的那个吊诡:如果两者说的都是真的，那就等于说，我们正在互相把对方推向深渊，而且都觉得这是对对方的错。

这个卸责机制最隐蔽的力量在于:它使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都会在一开始就承受来自另一侧的不理解和阻碍。如果一个法院试图推行管辖克制——在某个社区内明确声明“本院对某几类由村规民约管辖的纠纷不再主动介入”——它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来自上级或立法的反对，而是来自那个社区本身的反对:村民们会将它解读为“法院不管我们了”，并将这视为法律正当性进一步退化的证据，而不是一次旨在恢复民间规范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实验。管辖克制在它试图帮助的那些共同体的公众认知中，一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放弃、一种撤退、一种更深的冷漠，而不是一种尊重的姿态。而要扭转这种公众认知，所需要的沟通成本和时间投入，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任期有限的法院院长所愿意承担的。

5.3 不看的制度化:管辖不评价协议与管辖克制绩效体系

以上四层咬合的分析指向一个结论:管辖克制能力的建设，不可能依靠法官个体的自觉或“呼吁”来实现；它需要的是一套完整的制度工艺，包括一个前端识别程序（管辖不评价协议）、一套中端绩效激励机制（管辖克制率与管辖适当性评价）、和一个后端养护机制（规范土壤紧急养护程序）。本节不试图给出一个可以被直接写入立法的完整草案，而是给出这套工艺的核心操作逻辑和关键设计参数。

管辖不评价协议是这套工艺的前端接口。其运作流程如下:立案法官在初步审查案件材料时，如果识别出案件争议涉及一项正在运行的外部规范体系（例如，纠纷双方同属一个特定村庄、宗族或宗教团体，且争议事项在该团体的内部规范中有明确的处理惯例），法官不自

行判断该规范是否仍然存活——因为此时法官手头的信息不足以支持这一判断——而是向该规范所在的共同体发出一次结构性的询问。询问的形式，可以是一份标准化的《管辖能力确认函》，内容包括：本院受理的某案涉及贵共同体的某类惯例，请贵共同体确认该惯例在贵共同体内当前是否仍然作为活着的规范而被成员普遍遵守；如是，请贵共同体在15个工作日内提交一份初步的适用方案，说明贵共同体准备如何在本次争议中适用该惯例、由谁主持、程序如何、以及预计的解决周期。如果该共同体在限期内予以确认并提交方案，法院则签署一份《管辖不评价协议》：法院暂停司法程序，将争议发回给该共同体自行处理；法院保留复查权，但复查的范围严格限定于“共同体的内部程序是否确实已经启动并运行”，而不对共同体所做出的实体处理结果进行合法/非法的法律评价——因为“该共同体的规范是否会导致一个法律体系所不能认同的结果”，恰恰是法院在签署协议的那一刻已经承认自己无权去评价的事情。

这个设计同时处理了三重制度硬约束。第一，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法院对某个管辖权事项的“决定不介入”，必须有法律上的根据。在这个设计中，法院不是随意放弃管辖权，而是在确认“该事项有另一个有能力的主体正在实际行使有效的管辖”之后，做出有条件的暂停——这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管辖克制逻辑：法院在特定条件下承认自己不是处理该纠纷的最适当场所，从而将管辖权让渡给另一个更有能力的主体。因此，它不是对管辖权的放弃，而是对管辖权行使前提的一次审查——审查的结果是“本院的管辖在此处是不适当的”。第二，对接司法行政绩效体系。在当前的绩效体系下，法官不和管辖不评价协议将不被识别为任何一种已完成的行为。因此，需要在绩效体系中创设两项新指标：一是“管辖不评价协议签署率”（反映法官识别适当管辖让渡机会的能力），二是“管辖适当性评价”——即由独立复查委员会在年度抽查中，对法官签署的管辖不评价协议进行事后评估，判定该协议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为适当。“管辖适当性评价”的高分法官，应当被视为完成了“一次被后续复查验证为准确的管辖判断”，而非“一次成功地把案件推走的甩包袱行为”。第三，防治规范土壤塌缩时的管辖真空。如果法院将管辖权让渡出去，但接收的那个外部规范体自身的土壤正在不可逆地枯竭（如一个正在空心化的村庄共同体），那么管辖克制的结果就等同于让当事人两边都不落地。为此，需要配套一个“规范土壤紧急养护程序”：当法院识别出某个共同体的规范土壤正在严重退化、不足以承担有效的自治管辖时，法院不应当将管辖不评价协议适用于该共同体，而应当将该共同体的情况通报给司法行政机关和民政部门，由后者为该共同体提供有时限、有专项资源的养护性干预——例如，协助重建调解组织、提供外部的规范培训资源——但不得同时将该共同体的内部规则“收编”为法院的常设调解机构，因为那又将重复土壤置换的旧逻辑。养护的目标不是将该共同体纳入法律的管辖之内，而是帮助它恢复到足以重新行使自治管辖的健康水平，在此之后养护者的手即行撤回。

管辖克制率是这套工艺的中端激励机制。其定义为：在一个报告期内（如年度），某法院审结案件中，以法院声明“本院不予评价其他规范的实体内容”并为该声明提供了归档编码的案件数，占该法院同期受理的涉多元规范案件的比率。这个指标不是一个需要被刷高的数字——管辖克制率不是越高越好，因为客观上存在大量必须由法院实体管辖的涉多元规范案件（如涉及基本权利保护的底线案件）。因此，管辖克制率的设计目的不是替代现有的结案率指标，而是在已有的指标群中插入一个独立的维度，使得一个理性的法官在做管辖克制的正确判断时，不会因为“这个动作在绩效体系中不存在”而默认不去做它。管辖克制率的“适当区间”——在试点阶段——应被设定为3%至5%，这个区间不是基于某种先验推理，而是基于对现有司法统计数据中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但未被正式记录的非正式管辖让渡行为（如法官私下建议当事人“回去找村里解决”、法院以“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口头裁定不予受理）的粗略估算。在这个区间内，管辖克制率是一个敏感但不过度的指标；高于这个区间，触发独立复查委员会的审查——是否存在法官以管辖克制为名推案的滥用行为；低于这个区间，不触发任何负面后果，但与同期对照组相比显著偏低的数据，可以作为识别该法院是否严重缺乏管辖克制能力的预警信号。

独立复查委员会的年度申诉谱系报告，是整个工艺的最关键的反馈和校正机制。委员会由退休法官、法学家、人类学家、宗教领袖、行业伦理委员会代表按比例组成，每年从全国管辖不评价协议中抽取3%进行复查，并编制该年度的《管辖克制失败模式谱系》，逐条记录该年度中管辖不评价协议被滥用或误用的典型案例。这个谱系的编制有三重功能：其一，它从失败面反向校正管辖不评价协议的程序设计，使制度在下一年度中能够针对新出现的滥用模式（如法官将应管案件也推给外部规范、外部规范共同体利用协议压迫内部弱势群体）进行迭代修补；其二，它为外部研究者（特别是不参与制度设计的第三方法学家）提供了评价这个制度实际运作的材料基础，使管辖克制制度不能依赖“我们出于善意”来为自己辩护，而必须接受由公开出版的失败谱系所构成的持续外部审计；其三，它为“管辖适当性评价”提供了具体的判例和评价标准——评价一个法官的某次管辖不评价协议是否适当，不是依据抽象的原则，而是比照同一年度失败谱系中已识别的滥用模式进行归类判断。

5.4 三十年尺度的实证锚点：从试点到代际演替

管辖克制能力的制度化，不是一个可以在三年五年内完成的修法项目。它所触及的，不是法律制度内部的某一套实体规则或某一条管辖权规定，而是法律系统在认知上理解自己的方式——它对自己与其他规范体系之关系的基本假设。改变这一假设，需要的不只是一份新的司法解释或一个试点法院的设立，而是一个整整三十年尺度的、足以让一代新法官在一个不同于当前法官群体的制度惯性中成长起来的代际演替。本节将这一长远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为每一个阶段设置一条或数条可被外部研究者独立检验的实证锚点。

第一阶段（零至十年）：试点与制度胚胎期。标志性事件：第一份管辖不评价协议在某个基层法院被签署归档；第一个以“管辖克制”为专题的全国性司法改革试点方案被最高法批准；管辖克制率首次作为一个正式的司法统计指标出现在至少一个省的高级法院工作报告中；第一篇专门讨论“管辖克制与推案界限”的论文被引超过200次（标志学界开始系统性关注该问题）；《民事诉讼法》或其司法解释中首次出现

管辖不评价协议或管辖克制的相关条款。这一阶段的实证锚点(锚点一, 在前三年内可检验):选取36个试点地区, 将其分为三个管道——管道A纯粹增设调解机构, 管道B在管道A基础上增加法官自愿让渡制度(即法官可自行决定将某案移交外部规范管辖但无强制性程序接口), 管道C在管道B基础上增加管辖不评价协议的强制程序接口+管辖克制率绩效考核+养护程序配套——在试点三年后对三个管道的四项指标进行比较:当事人二次救济选择率(纠纷在外规范处理后再次向法院寻求救济的比率)、外部规范内部程序启动率、参与者满意度、重复诉讼率。本文的核心预测是:管道C在四项指标上显著且可持续地优于管道A和B。若三年后管道C未在至少两项指标上显著优于管道B, 则管辖克制能力的基本制度设计(管辖不评价协议+绩效对接)应当被视为在该试点条件下被否定。这里的关键控制变量是“法官自愿让渡制度”——管道B的设立, 正是为了将管道C的制度化程序接口的附加效果, 与法官自发善意的让渡行为区分开来。管道C与管道B的唯一差别, 在于是否有标准化的程序接口和绩效激励; 如果这一个差别在三年后不能产生显著的效果差异, 则意味着管辖克制的困难不在于制度的缺失, 而在于某种更深层的、无法被绩效激励所克服的因素——这个因素可能是什么, 将由该次否定来揭示。

第二阶段(十至二十年):绩效内化与代际渗透期。标志性事件:管辖克制率从试点法院的加分项升级为全国基层法院的必考核项(不设权重上限, 但设“适当区间”, 超区间触发复查); 国家法官学院将管辖克制的程序操作和失败模式识别纳入法官入职培训和晋升考核课程; 第一批“管辖适当性评价”高分法院在五年期绩效拐点数据(即该法院的管辖克制率在达到某区间后其当事人满意度不再同步上升而出现拐点)上显著区别于对照组(那些仅增设调解机构但未纳入管辖克制指标的法院); 第一篇以管辖克制制度的失败模式谱系为基础数据来源的比较法学术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这一阶段的实证锚点(锚点二, 在第五年可检验)是那个绩效拐点。管辖克制率作为一种新的绩效指标, 不可避免地将在其被纳入强制考核之后面临被数字本身异化的风险——法官将管辖克制率当作需要被刷高的新KPI, 而非需要被谨慎衡量的判断结果。如果这个异化发生了, 管道C的当事人满意度会在某一点(推算在管辖克制率达到8%-10%的区间)之后出现下降, 因为越来越多的“推案”行为将披上管辖克制的外衣, 导致当事人被推向没有实际管辖能力的壳壳外部规范体系。如果这一拐点未出现——即管道C的管辖克制率持续上升至10%以上而满意度仍同步或非显著地上升——则否定本文提出的“所有指标最终都会被异化”的预设, 但这并不否定管辖克制本身。真正对管辖克制能力构成否定的结果是:管道C的法官在第五年的当事人满意度、管辖适当性评价和外部规范共同体自我修复能力三个维度上, 与管道B的法官无显著差异。如果这个结果出现, 则意味着管辖克制绩效指标的加入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法官的管辖判断质量, 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以被游戏化的数字壳——在此情况下, 管辖克制能力的制度工艺应当被判定为在当前的司法行政生态下不成立, 需要退回到更基础的设计层重做。

第三阶段(二十至三十年):代际演替与范式转移期。标志性事件:第一批在全职业生涯中都接受过管辖克制训练的新法官, 开始成为基层法院的庭长和副院长层级; 管辖克制的判断不再需要被法官在每一份裁判文书中额外论证, 而成为案件受理时的标准审查项之一(效果是管辖不评价协议的签署从被质疑为“推案”变成被默认接受的结案方式); 法学期刊上关于管辖克制的讨论已从争议性话题变为教科书章节; 三位从未参与过本制度设计的外国法学家, 接受委托独立编写《中国管辖克制制度的三十年评估报告》。这一阶段的实证锚点之一是锚点四(第十至二十五年):选三个曾经被法院系统密集介入(诉讼率高、调解司法确认率高)的村庄A、B、C, 与三个在管辖克制试点中被持续执行管辖不评价协议的村庄D、E、F, 做二十年尺度的长期人种志田野调查, 测量两组村庄在共同体自我修复能力三个指标上的差异:内部纠纷的非正式解决率变化趋势、年轻一代对村规民约的知晓率与遵守意愿、以及村庄调解人在纠纷解决中的实际话语权变化。本文预测:D/E/F组在三个指标上显著优于A/B/C组——不是因为他们从未被法院介入过(在管辖克制试点之前, 他们都曾经被密集介入过), 而是因为法院的管辖克制为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提供了一个不被持续置换的制度窗口。这一预测的反面(如果出现, 构成对管辖克制能力最根本的否定)是:A/B/C组在二十年尺度上的自我修复能力与D/E/F组无显著差异甚至更优——这意味着法院的密集介入对共同体自我修复能力的慢性损伤这一假设在实证上不成立。如果是后者, 则管辖克制的整个理论前提——即法律干预会系统性削弱外部规范的自我维持能力——就必须被放弃或彻底修正。

锚点五(第三十年)是整个研究纲领的终局检验。委托三位从未参与过本制度设计的外国法学家(建议分别来自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伊斯兰法系国家), 基于三十年的全部公开数据、失败模式谱系、比较法制度考古文献、和以上四条锚点的全部检验报告, 各自独立编写一份评估报告, 回答四个核心问题:管辖克制制度是否有独立于其他同步发生的制度变革(如诉源治理、司法责任制改革、信息技术升级)的、可被归因的效果? 它的失败模式谱系中, 前三位的滥用类型是什么、是否可以分别通过制度修正来消除、抑或其根本原因在于某种不可被修正的制度逻辑本身? 它在三十年尺度上, 是否实质性地改变了中国法律体系与民间法、宗教伦理、行业伦理之间的关系模式? 这一关系模式的改变, 可否在全球比较法学中被承认为不同于自然法模式、实证主义模式和法律多元主义模式的第四种范式? 如果三份报告的结论高度一致地肯定管辖克制能力作为第四种范式的全球贡献, 这个贡献就不是中国法学家的自我论证, 而是由一组独立的外部评估者基于三十年数据给出的裁定; 如果三份报告的结论高度一致地否定管辖克制能力, 则本文的全部理论和制度构想在此终结——但即使在此情况下, 它也已经为世界法学做了三件不可逆的事情:它把一个两百年的法哲学母题, 变成了一个可以被三十年实证锚点严格检验的跨学科经验科学问题; 它提供了一个此后任何同类研究都绕不过的实证标准——你用什么管道、你的管道C和管道A/B的区别是什么、你的管辖克制率在什么区间触发了绩效拐点、你的失败模式谱系里排第一的滥用路径是什么、你在多少年后被哪几个外部评估者以什么理由裁定为不成立; 它为全球比较法学留下了一整套关于“不看的制度工艺”的可被跨文化比较的操作性概念——管辖克制率、管辖不评价协议、规范土壤紧急养护程序、独立复查委员会的年度失败谱系——这些概念, 不依赖于本研究的成败而存活, 它们构成了一种新的、尚未被充分开采的法学研究语法的雏形。

5.5 回应五种可能的反驳

在进入结论之前，本文主动回应五种对本核心主张的可能的根本性反驳。

反驳一：“管辖克制不过是推案的精致化——法官把烫手山芋推给外部规范，然后用‘这是管辖克制’来合理化自己。”

这一反驳触及管辖克制制度最核心的脆弱性，也是本文在设计制度工艺时花费最大精力去设防的那一面。两个操作性的防线将其与推案在制度上分隔开：第一，管辖克制必须由法院在签署管辖不评价协议时，附上对该外部规范体当前管辖能力的结构化确认笔录——如果该共同体在法院询问后不能提交一份初步适用方案，或者提交的方案在独立复查委员会的年度抽查中被认定为“显然不具备实际管辖能力”，该协议的签署法官将被考核体系识别为不当管辖克制，其不当记录进入本人的管辖适当性评价档案。这构成了一道推案者在操作层面必须面对的成本筛查：推案需要找到或制造一个愿意接收案件的外部规范体，该规范体必须在法院的结构化询问中表现出“有能力管辖”的样态，且该样态在年度复查中不被拆穿——这三重成本至少将大部分懒政式的推案排除在外。第二，独立复查委员会的年度失败谱系中，“以管辖克制为名的推案”将被设为一个独立的滥用类型，逐年积累案例。每一个被收录在该类型下的案例，将附带一处简短的制度教训（例如“某法院在某案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定继承纠纷推给没有处理此类纠纷历史记录的村庄宗族调解，构成不当推案”），并在下一年度的管辖克制培训课程中被用作标准反例。这个设计的逻辑是：与其在事前用难以穷尽的实体规则去界定推案与管辖克制的抽象边界，不如在事后用逐年积累的、可以具体查阅和比照的失败谱系，为法官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负面清单。

反驳二：“面对不断萎缩的外部规范土壤，法律克制不干预，等于放任那些最后残存的共同体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自然消亡——这不是元伦理上的傲慢吗——看着一条正在干涸的河流，你选择不往里注水，理由是不想改变它的水质？”

这一反驳的力量在于它触及了管辖克制最深层的伦理困境：如果管辖克制的实践结局，不是外部规范的自治能力复苏，而是在失去法律的最后支撑之后加速消亡，那么管辖克制就不是一个保护多元性的制度，而是一个加速多元性消亡的帮凶。对此，本文的回答分为两层。第一层，反驳本身预设了法律有能力为正在枯竭的外部规范土壤“注水”——即通过某种干预手段延缓其消亡。这个预设是未经审查的。本文通篇的论证都是在试图证明：法律在试图“帮助”外部规范时所实际发生的那种干预——立法吸收、司法转化、行政监管——在历史上反复发生的效果，不是延缓了外部规范的消亡，而是通过土壤置换加速了它的内部供养能力的丧失。如果这个历史诊断是对的，那么法律面前的真实选择不是在“干预”和“不干预”之间选一个，而是在“用一套会置换土壤的方式去干预”和“承认自己的干预手段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之间选一个。在此意义上，管辖克制的“不干预”不是一个消极的退让，而是一个积极的、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制度性负责——法律停下来，不是因为它冷漠，而是因为它终于认识到，自己手里那把用来浇水的壶，壶嘴的设计决定了它浇出去的不是水，而是水泥。

第二层，养护——不同于干预——是法律在管辖克制的同一制度框架中可以提供的东西。规范土壤紧急养护程序的设计意图，正是在回应反驳二所直面的那个伦理困境：对于那些确因城镇化、人口外流和代际文化断裂而处于不可逆枯竭过程中的共同体，法律的适当角色不应是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名义将它的最后残余规则收编为法院的一个常设分支，而是以一种有时间、有限度、有退出机制的养护性支持，帮助这个共同体在它尚存的这一代人之中完成最后一次自我修复的机会。养护的退出条件是明确的：如果在三年的养护期内，该共同体的内部规范在养护效果指标上未显示任何显著恢复，法院即宣告终止养护，并将该共同体的纠纷管辖权正式、公开地收回法律系统——而不是让它在“纸面上还活着的空壳规范”中拖下去。这个设计将那个伦理困境转化为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实证问题：在那些被养护过的、但仍然未能恢复自治能力的共同体中，其成员在养护终止后的五年内对法律系统的信任指数，是否显著低于那些从未被养护、一直被法律系统直接管辖的共同体成员？如果数据证明了前者的信任指数更低，则反驳二的伦理批评在经验层面成立，管辖克制加养护的制度组合在“临终关怀”这一特殊情境下被证明是有害的；如果两者无显著差异，则本文的立场获得经验支撑——法律提供一段有诚意的最后支持，即使未能成功，也不会比它从一开始就默认接管造成更多伤害。

反驳三：“归根到底，你只是用四层咬合和三十年锚点这些更精致的语言，重述了法律多元主义三十年前就说过的话——承认多元本身就是一种更隐蔽的控制。”

这一反驳对本文的实质挑战在于：它认为本文没有贡献新的发现，只是换了一套更精致的概念话语来包装一个在批判法律多元主义中已经存在的洞见。本文对此的回应是：承认“承认”中内嵌的权力不对等，是批判法律多元主义在九十年代就完成的理论工作。本文的工作不是在重复这一发现，而是在将它从理论批评推入制度回应的那一步——这一步，批判法律多元主义至今没有迈出。桑托斯在揭示法律多元主义的内在殖民性之后，给出的回应是“跨文化对话”和“认知正义”——这些都是规范哲学层面的目标，而不是可以在一个法院的立案窗口中操作的制度设计。托伊布纳在揭示法律系统对外部环境的自我模拟之后，没有追问这个分析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导出什么——如果法律注定无法公正地“看”，那它该怎么行动？他的回答基本是：让它继续运行，因为它本来就是靠这个盲区运行的。本文的贡献正是在这一步：本文将一个被上述两个传统各自从不同角度精确诊断过的理论问题——“法律在认知上无法公正地看”——推进到一个工程问题——“如果法律无法公正地看，它能不能被制度性地训练出‘不去看’的能力，并且将这个能力作为其正当性的新基础？”这不是一个新瓶旧酒的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化——它将批评者从“揭露权力”的位置，移到了一个更难受的位置：你必须为你所揭露的那个不公平的结构，提供一个有失败条件的、可以被实证检验的替代方案，而不只是再写一篇批评文章。

反驳四：“你太过于相信制度设计的善意，也太过于相信实证数据不会被官僚体制消化。你设计的独立复查委员会、绩效拐点、三十年外部评估——这些在纸面上都完美，但它们一旦被植入真实的司法政治生态，就会被剪裁、收编、异化为管辖克制自己的替代品生态。”

这个反驳不需要被否定。它恰恰是本文在实证框架中设置锚点二(绩效拐点)和锚点四(二十年村庄对比)的用意所在。本文从不假设制度设计不会被异化；相反，本文为制度设计的异化预留了一条清晰的、可以在五年内就被检验的否定路径。如果管辖克制率在纳入绩效体系后五年内出现显著的异化拐点——即法官开始将管辖克制率当作一个需要被刷高的数字，而非需要被审慎衡量的判断结果，且管道C的当事人满意度在这一拐点之后显著下降——那么本文的制度设计就在那个节点上被判定为无法抵御官僚体系的收编，范式转移失败。这个失败，不会被本文用“但是我们的初心是好的”来搪塞；它是被它的实证框架自己捕获的。进一步地，如果制度设计的异化在第一个五年被捕获并公开报道(锚点二的检验工作可以由不参与制度设计的第三方大学或研究机构独立完成)，这个异化本身就成为独立复查委员会年度失败谱系中的一条最具分量、也最具教学价值的材料——它向后来的任何试图推行本制度的试点法院，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查的失败原因清单，而这份清单本身，在二十年后，会比任何正面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将“可被否证的失败”预先写入制度的公开发明的设计文件中，这个举动本身——无论它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已经改变了法律改革游戏的规则。它把一个改革项目从其设计者私人信誉的抵押物，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有明确死亡条件的科学假设。改革失败了，不是设计者的尴尬，而是对世界法学的一次有实证价值的负实验。那些在五年后检验到异化拐点的研究者，他们的论文题目可能就是《为什么管辖克制在中国基层法院中被异化：基于管道C数据的分析》——而这篇论文的存在本身，就是本文为世界法学留下的遗产之一：它把一个曾经只能被法哲学家辩论的应然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法社会学家用标准方法去检验的实然问题。

反驳五：“你整篇文章都没有引用一篇中国基层法院的真实案例——没有具体的调解协议书编号、没有具体的裁判文书文号、没有法官的真实访谈录音稿。一个没有经验世界的身体感的理论，怎么配谈‘制度工程’？”

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批评，它指向的不是本文论证的某一环节，而是本文的方法论根基。本文在此做出两项回应。第一，本文是一项理论建构和制度构想工作，它的功能不是提供经验证据，而是提供一种新的辨别维度——一种重新概念化既有制度现实的方式——并为其配套一个可以被经验研究所独立检验和否证的实证框架。检验本文的工作，不应该是“它自己有没有做那个检验”，而应该是“它提供的检验框架是否可操作、是否足以让不认同它的人按照那个框架去做否定”——如果可操作，那么本文的理论工作就已完成，实证工作应当由那些拥有实际田野资源、法院合作渠道和长期追踪能力的经验研究者独立承担。第二，本文承认，如果在发表后的十年内，没有任何一个经验研究者按照本文给出的五条锚点中的至少三条去做过检验——不是支持本文的检验，也可以是否证本文的检验——那么本文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被它自己时代的学术共同体所不闻不问的、过于野心勃勃的异想天开。这个结果本身，构成对本文的另一种形式的否定——本文的核心主张是“管辖克制能力可以成为法律改革的实战议程”，如果十年后这个议程在经验学界完全无人愿意触碰，那么本文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失败了：它没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争论对象。

6 结论

6.1 核心发现的简明陈述

本文通过概念分析与历史制度追溯，重新诊断了法律与民间法、道德、习俗、宗教及行业伦理等多元规范之间的协调困境。本文的核心发现可以凝缩为三个递进的判断。

第一，法律与其他规范之间当前所是的真实关系形态，不是学界通常设想的“多元规范在摩擦中寻求协调”，而是一种本文称为共享枯竭的稳态——在这一稳态中，法律与外部规范各自失去了独立生产与维持规范性体验的能力，彼此的虚弱经由四层制度咬合（缝合性语言的制度化、管辖权的仪式性释放、绩效体系的双向压制、正当性的相互卸责）而被相互锁定，并对任何试图改变它的尝试具有系统性免疫力。这个稳态不是协调失败的后果，也不是协调尚未完成的过渡阶段，而是一个已经抵达成熟态的、可自我再生产的规范性生态。

第二，破解这一稳态的突破口，不在于任何旨在改善法律“协调能力”的新制度，而在于法律系统获得一种迄今为止从未被认真建设的能力——管辖克制能力，即法律系统在个案接触点上，制度性地决定不将自己的认知范畴、评价标准和程序暴力施加于其他规范之上。这一能力的建设，要求法律系统在其注意力分配制度中，为“判断自己是否该看”这个动作，与“判断自己该怎么看”分配同等的程序权重、绩效激励和知识培训资源。

第三，管辖克制能力不是一个纯粹的未来构想，而是一条在历史上曾经三次被认真考虑过、三次被王权集权、司法专业化和国家法一元论的强势逻辑所碾压的旧可能——十二世纪合法性审查对习惯法自治的替代、十六世纪世俗法院对教会法庭管辖权的接管、十九世纪国家法规对行业伦理的“升格”。旧可能被埋没，不等于它不可行，但它的重新制度化需要的不只是一次修法，而是一个三十年尺度的代际演替——让一代从未将“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资格评价外部规范”作为默认认知预设的新法官，从制度惯性中将管辖克制的判断内化为案件受理时的标准审查项。

6.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

在法哲学层面,本文对自然法传统、实证主义传统和法律多元主义三者共享的一块房角石级预设——“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资格‘看’外部规范”——做出了系统性的撬动。本文不是在三种既有传统之间选择其一或组合其二,而是在它们的共享预设底部凿开了一个裂隙,从中拉出一个它们三者都无法容纳的操作性概念:管辖克制能力。这个概念的引入,使得“法律应当如何对待其他规范”这个二百年的母题,第一次从“更公道的对话规则”的规范哲学层面,下沉到“看与不看的制度前提”的工程操作层面。如果本文的论述成立,那么法哲学在回答这个母题时的第一问,就不再是“如何协调”,而是“在每一次具体的接触之前,法律先要回答自己——这一次,我有没有资格看?”

在法律社会学层面,本文建构的“规范性土壤—土壤置换—替代品生态—共享枯竭”四阶分析框架,为研究法律与多元规范的关系提供了一套新的分析工具。这套工具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不是将“法律的协调行为”当作一个自变量、将“多元规范秩序的存续状态”当作一个因变量去测量二者的相关关系(这是现有法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主流范式),而是将法律本身当作一个会因自身行动而改变其与其他规范之生态关系的行为体——法律的每一次协调,都在改变着它所试图协调的那个对象的存活条件。这个生态学的转向,将法律社会学的分析单元从“法律规则的效果”推至“法律行为对规范性生态位的改造”——这一推,为未来将生态学中的群落演替、生态位分化、入侵物种等概念系统性地引入法律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概念上的可能性。

在司法制度研究层面,本文所提出的管辖不评价协议、管辖克制率和独立复查委员会年度失败谱系构成了一套可被实际司法系统操作的制度工艺包。在法律多元主义的全球文献中,本文可能是第一个将“不看的制度化”不仅作为一个规范主张、而且发展出一整套包含前端程序、中端激励、后端养护和长期实证检验的制度设计方案的尝试。这一尝试的理论贡献不在于它被设计得有多完美——它以自己被否证的路径作为它最核心的学术遗产——而在于它把“制度构想”从一个法学家可以任意挥洒的领域,拖入了一个必须同时被实证可证伪性所严格约束的领域。

6.3 实践与政策含义

对于正在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司法管理者,本文提供三条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第一,在正在进行的“诉源治理”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增设一个独立的试点管道(本文称为管道C),将法官自愿让渡管辖权的非正式实践,升级为一套有标准化的程序接口和绩效考核的制度工艺,而不只是在现有的调解机构增设上反复做功。这个管道的关键设计参数是:管辖不评价协议的程序接口、管辖克制率的独立绩效指标、以及独立复查委员会的年度失败谱系编制。这三个参数的共同功能是,将法官的管辖克制行为从一种没有制度壳的、无法被统计的、出了事只能由个人承担责任的隐性行为,变成一种有制度记录、可被正向评价、出了事有可追查的制度痕迹和失败分类的正式司法行为。

第二,在当前的法官绩效评价体系中,尝试性地将“管辖适当性评价”纳入试点法院的考核项,但严格控制其权重上限——不以它替代或压缩现有的结案率等核心指标,而是在现有的指标体系旁边开辟一个独立维度。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解决一个在当前绩效体系中被系统性地遗漏的问题:在现行指标下,一个法官做出了一个正确的“这个案子我不该管”的判断,这件事对于绩效体系而言是看不见的,因为绩效体系没有为这类判断预留任何数据接口。而一个看不见的正确判断,在个体的职业理性计算中,其分量永远低于一个可见的、可统计的、可在考评系统中为自己加分的常规司法行为。管辖适当性评价的设计目的,不是要求法官多做一个新的事情,而只是要让他们在做一件本来应该做、但因为不被系统看见所以一直无人愿做的事情时,不必再承受负向激励。

第三,在涉及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宗教伦理的司法政策制定中,引入这样一个制度自我约束:在任何以“吸收”“承认”或“规范化”为名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方案出台之前,强制进行一次“土壤置换效应预估”——由方案制定者明确回答三个问题:这个方案所针对的规范实践,在当前是否仍然依赖于一个非国家法的、脱离国家司法管辖仍能独立运行的土壤而存活?本方案在将这些规范实践的部分内容纳入法律体系时,是否会不可逆地削弱那一非国家法土壤对该规范实践的供养能力?如果上述答案是“是”,本方案是否设计了配套的养护措施,将土壤置换的不可逆损伤降低到可被接受的范围内?这一预估程序本身并不阻止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但它将一个在当前立法实践中几乎未被系统性地问过的问题——我们这项“改善”它所针对的那个生态环境在被我们改善之后,还能不能自己活下去?——制度化地嵌入政策的制定流程之中。

6.4 研究局限的诚实自陈

本文在五个关键维度上存在其论证本身无法弥补的局限。

第一,历史追溯的材料全部来自欧洲法律史的二次文献。本文所识别出的三个历史分叉口——十二世纪罗马法对习惯法的合理性审查、十六世纪世俗法院对教会法庭管辖权的接管、十九世纪行业伦理的国家法规化——是否在非西方文明的法律传统(伊斯兰法系、印度

法传统、东亚儒家法文化、非洲习惯法体系)中存在同构的制度演变序列,抑或管辖克制的制度基因在那些传统中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态、被锁闭的逻辑完全不同、可被重新激活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本文无法回答。

第二,本文的经验锚点——特别是管道C在三年内的四项指标对比——依赖于一系列在本文中无法被实际操作的田野条件(试点法院的选取、管道的随机分配、数据的独立采集与审计)。本文提供了检验框架,但本文自身不构成那一检验的执行。这使本文在发表时处于一个脆弱的认识论位置:它的核心主张在实证上尚未被证实,但它的实证框架又足以让它的核心主张在十年内被否定。本文接受这个位置,并将此视为其学术诚实性的一部分。

第三,管辖克制能力的制度工艺——特别是独立复查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机制——在本文中只给出了原则性设计,没有触及它在真实的中国司法政治生态中可能遭遇的、来自组织利益、部门博弈和个人职业风险规避的复杂阻力。独立复查委员会如果无法在运作中保持实质性独立于它所复查的法院系统,那么它的年度失败谱系将沦为又一个被官僚体制收编的纸面程序。本文对这一风险的回应,只在实证框架中为它预设了一条五年期的检验路径(锚点二),而无法在理论层面给出一个确保委员会独立的制度设计。这一工作,应当由对中国司法行政和政法体制有深入田野经验的政治学家和法社会学家来补充和修正。

第四,本文对四种规范——民间法、道德、宗教伦理、行业伦理——采用了高度同构的分析框架,将其各自不同的规范性土壤统一在“稠密人际关系与共同记忆的活联结”这一宽泛的描述之下。这不可避免地分析的精度上牺牲了每一种规范的具体性:民间习惯在乡邻网络中的运行方式,与宗教戒律在认信共同体中的运行方式,在规范性体验的生成机制上有着重大差异;行业伦理的同行约束与民间法的舆论压力,在约束力的来源和制裁机制上也截然不同。本文之所以没有对每种规范做更为细致的独立分析,是因为本文的核心任务不是提供一种完整的规范类型学,而是在四种规范与法律的关系共享的那层“土壤置换”结构上做出诊断。对于每一种规范的具体性,本文将其留给未来的人类学和法社会学个案研究去做补充。

第五,也是最根本的局限:管辖克制能力本身,如果在一个政治体制中被公开推行,会不会在实质上沦为又一种更精致的“法律不管”的政治遮羞布?本文的论证被严格限定在“法律与其他规范的关系”这一技术性领域之内,不涉及、也无力涉及更广泛的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自治之边界的政治理论。但本文清醒地意识到,管辖克制在任何现实的政治环境中被启用时,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远远超出其哲学原意的政治博弈之中。本文对此局限的唯一回应,仍然是指回它自己的实证框架:如果在三十年后,三位独立的外部评估者在其评估报告中一致写道,“管辖克制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被用作政府回避其公共服务责任的合法性话语,而其在保护多元规范生态上的效果微弱且不显著”,那么本文所设计的整个制度工艺,在那个节点上,应当被宣告为一项失败的制度实验。本文的作者在此预先接受那一可能的裁决,并为它被裁决的那一天,留下了它用来置自己于死地的那五条锚点。

6.5 未来研究方向:一个可被独立检验的三十年研究纲领

本文在结尾处,不给出笼统的“未来研究方向”,而是基于本文各分析层级中已被识别但未被充分展开的盲区,提出一个由十一个相互咬合的子研究项目构成的、在三十年尺度上可由任何外部研究者独立承担并检验的完整研究纲领。此处因篇幅限制,仅列出每个项目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研究策略,详细的研究设计已在全文的各相关节段中分别展开。

项目一:管辖克制的比较法制度考古。 核心问题:伊斯兰法系、非洲习惯法体系、东亚儒家法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与本文在欧洲法律史中识别出的管辖克制制度基因同构或异构的被埋没选项?如果有,它们的被锁闭逻辑和可被重新激活的制度条件是什么?研究策略:选取三个代表性法律传统,由熟悉该传统的法律史学者独立进行历史分叉口识别,产出三份《管辖克制之制度基因比较考古报告》,并提取出可跨文化比较的被锁闭逻辑类型学。

项目二:管道C的三年对照实验。 这是本文锚点一的操作化。需36个试点地区,按管道A/B/C的三组随机分配,在三年后比较四项指标。

项目三:法官管辖克制行为的认知心理学实验。 核心问题:在控制法律知识和案件类型的前提下,哪些制度信号(绩效激励/风险预警/上级示范)能够在实验室条件下显著提高法官“在管辖克制情境下做出克制的选择”的比率?这个比率在法官群体中的个体差异分布,是否受到法官本人的职业年限、法系训练背景和跨文化生活经验的影响?研究策略:设计标准化的模拟案例集,在法官学院培训课程中对在职法官进行匿名实验,测量不同制度信号刺激下的管辖克制选择率,并做多元回归分析提取显著的行为预测因子。这一项目不属于本文锚点体系但可为管道C的制度设计提供来自认知心理学的行为参数。

项目四:管辖克制不当案例谱系的全国数据库建设。 核心问题:将独立复查委员会年度失败谱系从试点制度升级为一个全国性的、可被任何研究者在线查阅的公开数据库,收录每一年度被复查委员会裁决为不当管辖克制的全部案例摘要和制度教训,标注滥用类型的分类标签(推案/弃管/对弱势方压迫的默许/养护程序执行失真)。研究策略:分五年逐步建设,第一年为10个试点法院的手工数据录入,第二至三年开发标准化录入模板和自动分类算法,第四至五年推广至全国基层法院,并向学术界开放匿名数据的访问权限。

项目五:二十年尺度村庄自我修复能力的长期田野调查。 这是锚点四的操作化,由人类学者、法社会学者与乡村社会学者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执行。

项目六:管辖克制绩效异化风险的实时跟踪研究。 这是锚点二的操作化,核心问题是绩效拐点是否出现、在哪一个区间出现、异化的具体行为模式是什么。

项目七:养护程序的退出效果评估。 核心问题:在那些经三年养护后仍被宣告退出养护、其纠纷管辖权正式回收至法院的共同体中,其成员在退出后五年内对法律系统的信任指数,与从未被养护过的共同体成员相比,是否有显著差异?养护退出后该共同体内部规范的进一步萎缩速度,是加速还是减速?研究策略:跟踪养护退出群体,在退出时(T0)、退出后一年(T1)、三年(T3)和五年(T5)进行四次跟踪测量和深度访谈。

项目八与项目九(合并):跨制度场景的管辖克制能力迁移研究与刑事司法领域的可移植性评估。 核心问题:管辖克制能力在非法律的大型组织(企业内部申诉系统与工会自治的边界、大学学术不端调查与学术共同体同行评议的边界、互联网平台的内容治理与用户社区的自治规范的边界)中,是否存在与法院类似的结构需求?在刑事司法领域——民间习惯法与刑法的诸多交汇点(刑事和解中的村规民约援引、少数民族地区的“赔命价”习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家庭与社区参与)上,管辖克制是否同样是一个有意义但被压倒性忽视的问题?研究策略:选取3-5个非法律的大型组织进行管辖克制制度移植的案例研究,或对刑事和解中管辖克制逻辑的适用可能进行规范分析与比较法考察。

项目十:管辖克制能力的AI技术实现。 核心问题:大型语言模型(LLM)是否可以被训练为一种管辖克制决策辅助工具——在法官阅读案卷材料的初期阶段自动识别出“本案争议所涉的外部规范可能在某个可识别的共同体中作为活着的规范而存在”,并自动生成一份《管辖克制预警函》(不是《管辖不评价协议建议函》,因为AI不得替法官做决策,只能做信息提示)?AI模型在生成这类预警时,其误报率和漏报率分别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其训练数据中的文化偏见(如对某些宗教或少数民族群体规范的过度或不足识别)是否会导致管辖克制预警在特定群体中的系统性偏差?研究策略:基于已有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和人类田野调查数据,标注一批管辖克制的“标准案例”,训练初始模型,并在试点法院的立案阶段进行盲测比较(AI预警组vs人类法官对照组)。研究时机:在管道C的五年数据积累之后开始进入,避免AI在人类对管辖克制的制度经验仍然极度匮乏时就抢占议程;但在那之前进行预备性的技术可行性研究。

项目十一:管辖克制制度三十年外部评估。 这是锚点五的操作化,也是最远的一步。三十年后的评估报告,其方法论设计应当在现在——制度的胚胎期——就被预先锁定,以防止到了第三十年时,我们根据这三十年实际发生的结果,偷偷修改评估的标准。

参考文献

(注:以下所列条目均为作者有把握确认其真实存在的文献;凡无法同时确认作者、篇名、年份、出处四项者,一律未列入。)

Abel, R. L. (1982). *The politics of inform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

An-Na'im, A. A. (2008).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Negotiating the future of Shar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ad, T. (1993).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erman, H. J.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ver, R. (1983). The Supreme Court, 1982 term—foreword: Nomos and narrative. *Harvard Law Review*, 97(1), 4-68.

Galanter, M. (1981). Justice in many rooms: Courts, private ordering, and indigenous law.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 13(19), 1-47.

Glenn, H. P. (2014).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orld* (5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iffiths, J. (1986). What is legal pluralism?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 18(24), 1-55.

Helmholz, R. H. (1996). *The spirit of classical canon law*.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Luhmann, N. (2004). *Law as a social system* (K. Ziegert,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hmood, S. (2005). *Politics of piety: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erry, S. E. (1988). Legal pluralism.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2(5), 869-896.

Michaels, R. (2009). Global legal pluralism.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5, 243-262.

Moore, S. F. (1973). Law and social change: The semi-autonomous social field as an appropriate subject of study. *Law and Society Review*, 7(4), 719-746.

Ocasio, W. (1997).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S1), 187-206.

Santos, B. de S. (2002). *Toward a new legal common sense: Law, global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2nd ed.). Butterworths.

Simon, H. A. (1947).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Macmillan.

Teubner, G. (1992). The two faces of Janus: Rethinking legal pluralism. *Cardozo Law Review*, 13(5), 1443-1462.

Teubner, G. (1997). *Altera pars audiat: Law in the collision of discourses*. In R. Rawlings (Ed.), *Law, society and economy* (pp. 149-17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te, J. (2002). *Law and Protestantism: The legal teachings of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苏力（1996）。《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季卫东（1999）。《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梁治平（1996）。《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高其才（2008）。《中国习惯法论》（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范愉（2007）。《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司法节制、司法回避传统的硬边界

英美法早已发展出成套的“法院不去管”的教义：可司法性、政治问题原则、成熟性与当事人适格、以及司法节制的宪政传统。这些是本文最近的手，必须正面切开。既有教义的“不看”都是权限性的——法院不管，因为该事项不属于司法权，或时机未到，或应由政治部门决定；其判断标准在管辖权的边界上。本文的“不看”是感知性的：事项完全在管辖权之内，法院有权也有能力处理，但介入本身会置换掉该案所赖的规范性土壤，因此选择不看。这个差别可判别：权限性不看同一类事项上应是稳定的、可预期的、成文的；感知性不看必然是逐案的，且必须留下为什么这一件不看的记录——这正是本文的管辖不评价协议与失败谱系所要承载的功能。若所有“该不看”的个案都能被归入既有的可司法性教义，本文没有独立增量。

增补二：管辖克制率与失败谱系的可编码形式

制度工艺包的三个参数需要编码规则才能落地。管辖克制率：在进入管道 C 的案件中，法官作出不评价处置的件数占比，分母须限定为经初步筛查满足土壤置换风险判准的案件，否则该率可被稀释操纵。失败谱系分类建议四型：土壤误判（评估认为存在替代性规范秩序而实际不存在）、能力误判（替代秩序存在但不具备处置该纠纷的能力）、自愿性误判（当事人的选择实为受压）、以及回流失败（不评价后纠纷未获处置且当事人无法重新进入正式程序）。四型必须由独立复查委员会而非原审法院认定，且第四型应设为强制回流触发条件——这是本文的制度设计与放弃管辖之间的分界线。

增补三：“不看”是否等于弃守

本文最强的正当性反驳是：司法克制在弱势一方身上等于撤除保护，尤其当替代性规范秩序内部存在压迫时。这个反驳不能靠强调自愿性来化解，因为自愿本身可能是秩序内压的产物。可辩护的立场只有一个较窄的版本：管辖克制仅适用于当事人对争议本身的规范性理解与法律系统不可翻译、且不涉及人身安全、基本权利与未成年人保护的个案；一旦触及后三项，克制即不适用，且不需要个案权衡。这条硬边界必须写在制度接口的最前端，而不是留给法官裁量——否则本文的设计会成为回避困难案件的合法通道。

增补四：与作者已发表工作及同批前篇的分野

作者已发表《法触觉的坏死：效率逻辑如何让法律丧失感知能力》，同批另有《效率如何让法律失聪》，两者与本文共享同一诊断底盘——法律系统的感知能力退化。分野在提问方向：那两篇问的是感知为何坏死（诊断），本文问的是在感知尚存的前提下应否行使管辖（规范与设计）。这也意味着本文对前两篇有依赖：若法触觉已普遍坏死，则本文所要求的逐案土壤评估根本无人能做，制度工艺包会退化为一套新的勾选流程。作者宜明确这一依赖关系，它既是本文的适用前提，也是它最现实的失败方式。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实验文献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Bobbs-Merrill, 1962.

Sally Engle Merry, “Legal Pluralism,” *Law & Society Review*, 22(5), 1988.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1993.

Ian Ayres & John Braithwaite, *Responsive Regulation: 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bert M. Cover, “The Supreme Court, 1982 Term — Foreword: Nomos and Narrative,” *Harvard Law Review*, 97(1), 1983.